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政府收入占比要有度

可能有人不同意“在现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管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水平下，中国的财政收入或税负水平太高”的说法，认为中国现在财政收入或税负并不高，只是使用结构不合理，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当然也很重要。2013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7.5%，近15年来首次低于同期经济增速。财政支出增速因此同比下降10.5个百分点，然而，维持政府运转的支出仅回落了3.8个百分点，用于民生的支出却回落了6.2个百分点。这种开支的结构性变化就值得认真关注。

但是，财政支出结构合理，财政收入占比就越高越好吗？或者，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福利水平还比较低，有关民生的财政支出就越多越好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任何经济体中，政府资源占比都应有所限制。即使计划经济，政府也不能把全部国民收入都变成财政收入，由政府统一分配。1978年，中国还是计划经济，当年包括国有企业全部利润在内的财政收入占比也仅为30.6%。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数万美元，财政收入占比可以高一点。观察一下，不难发现，即使高收入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收入占比过高，也是弊多利少。政府占用资源过多，必然导致市场机制失灵，经济活力、竞争力、效率下降，危及发展，祸及稳定。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在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尚且无法支撑过高的财政收入占比，中国对此更应慎之又慎。

中国现在的政府收入占比到底有多高？有不同算法。公共财政收入占比，2012年是22.6%，似乎不高，但是，它只统计了政府收入的65%左右；政府收入占比是35.64%，这已经高过日本、美国和德国。如果加上国有企业未上缴利润，则中国政府收入占比是39.87%。这些年来，各级政府纷纷举债融资。如果加上每年新增政府债务余额，2009—2012年，中国政府实际可支配财力占GDP比重分别为49.5%、43.1%、50.7%、50.9%。在中国现有人均GDP水平上，很难说政府收入占比还是太低了。

政府是行政组织，它分配与使用资源一般以行政而非市场方式进行。政府投资基本上是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超出一定比例，势必降低全社会资本产出率，政府支出用于民生，一般不是也不能根据市场原则，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而是根据收入水平高低，按需分配。政府实际可支配财力占比过高，势必导致全社会资源非市场配置的比例过高，导致政府替代市场，行政干预市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要有定性要求而且要有必要的数量界限。如果政府完全支配全社会的资源，那还有什么市场经济？还存在什么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空间？政府支配了50%以上的GDP，充其量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当务之急是大幅度减少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比例。以此论之，笔者认为，当前首先应当管住政府的手，重视降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无论这个政府收入是来自征税、收费，卖地、国企利润上缴，还是举债融资透支了未来的财政收入。因为，不如此，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2014年2月28日《经济参考报》李文溥）

不能让土地出让金成为一笔糊涂账

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3年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内地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4.1万亿元，再次刷新历史纪录，同比增长44.6%，占到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本级）的86%。从土地出让金的成交金额来看，几乎是逐年递增，而且是大幅递增。若将2001年至今的全国土地出让金进行加总，将近20万亿元，这些钱究竟用在哪里了？这笔钱究竟是怎么管理的？为何不用在保障房建设上？

实际上，中国的土地出让金管理、使用是一笔糊涂账，而且缺乏对其收支的监督和约束，从而大量的卖地所得不知去向，反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养得越来越多、开销越来越大。为了及时亡羊补牢，我建议对过去这些年的土地出让金收支进行重新审计，除了国家审计部门全面介入之外，还得邀请第三方审计机构介入，做一本公正、公开、明明白白的账目，并对外公布和披露，对于曾涉嫌违规使用土地出让金或者将土地出让金挥霍、挪用的相关责任人应该给予必要的责任追溯。

对于土地出让金的收支使用范围其实早在2006年国务院就曾有过要求，土地出让金必须足额安排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拆迁补偿费用，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的不足，结余资金应逐步提高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以及廉租住房建设和完善国有土地使用功能的配套设施建设。由于这些“要求”过于宽泛，缺乏操作性，于是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规定，将不低于15%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不低于10%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10%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等等。但究竟有多少地方政府是按照政策要求来执行的？实际情况是这些土地出让金并未用在这些指定的用途上，反而转化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而且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也是在不断提高，这一比例从2001年的16.6%提升到2013年的86%。于是，土地财政成了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的依赖，为了满足地方政府的“花销”，卖地行为就自然变本加厉。

当务之急，应尽快打破目前的土地财政格局，地方政府应开源节流和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土地出让金实施专项审计和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将土地转让信息公开，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土地出让金优先用于保障房项目、安居工程项目和符合土地出让金使用的项目。也可以将土地出让的程序和出让金账户从地方政府剥离出来，建一个全国性的土地公开交易平台，将土地转让信息公开，然后将收来的土地出让金放入中央财政专设的省级土地出让金账户，由中央财政暂作保管，然后根据地方政府申请的保障房项目、安居工程项目和符合土地出让金使用的项目再专款专用。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防止地方政府沦为纯粹的“经济人”，斩断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链条，避免我国国土资源被地方政府过度变卖和开发，不然地方政府只顾高价卖地和圈地，而忽视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毕竟，每一笔土地出让金换走了未来50~70年的土地使用权，相当于“爷卖仔田”，为了防止“代际不公”和寅吃卯粮，对这笔钱的管理、使用和监督一定要合理，否则如何对得起子孙后代？（2014年3月3日《中国经营报》苏培科）

研究生泛滥板子该打谁

近日，出席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建言，研究生规模必须控制，过去10年间，中国研究生规模增长了约10倍，但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研究生吗？那么多工作岗位真的需要研究生学历的人才能干吗？可以说，研究生群体已经泛滥成灾。

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小学和初中的在校生规模均在减少，其中小学在校生规模比上年减少14.34万，初中在校生规模比上年减少212.53万，总共减少了226.87万人，这是1998年以来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的连续14年减少。与此同时，研究生规模却在不断扩大——1994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仅4.7万多人，如今已超过每年60万人，20年间，研究生扩招疯涨了11倍，甚至超过了本科生。

近年来，感叹“研究生质量下降”之类的声音不时见诸报端。毋庸讳言，研究生质量确实在下降，但问题似乎并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学生本身。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研究生教育实行严格的导师制。李政道曾经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指出：研究生的培养，从根本上应采取一对一的模式。也就是说，导师质量的高低是决定研究生质量的关键因素。事实也正是如此，研究生作为导师的唯一“产品”，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身为“生产者”的导师又怎能置身事外？

现实情况是，研究生数量年复一年地过快增长，导致了包括师资在内的高校教育资源的紧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不少高校都在不断增加导师数量的同时，增加着每个导师所带研究生的数量。于是，一方面“粗制滥造”的导师数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导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仅仅将研究生当成了自己的“打工仔”，而疏于日常管理，甚至是将“放羊式”教学美其名曰“发挥学生创造性”。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先天不足”的研究生质量究竟还能否得到应有的提高？这无疑是“负激励效应”在大学内部的生动写照——研究生的盲目扩招导致学生质量“掺水”，由此引起导师数量和教学质量的“掺水”。

随着研究生大规模扩招的持续进行，其负面意义正在不断显现，反思因此而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板子显然不应该只是打在学生身上。更为关键的是，高校应该根据自身的师资力量以及教育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招生，而盲目追求规模必然会导致质量的下降。在这种“负激励效应”的环境中，任何单方面指责都是毫无意义的——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导师对研究生质量感到不满，无非是因为导师们牢牢占有话语权，倘若将话语权交给研究生，导师们的成绩恐怕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2014年3月3日《大河报》赵志疆）

◆热 词

【全面深化改革】毫无疑问，改革是2014年地方两会最热的热词。在多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被提及的平均次数约在50次左右，许多地方更是将“全面深化改革”单列出来，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与过去相比，今年地方两会上确立的改革领域更为广泛，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各地纷纷对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绘就的改革蓝本谋划着“地方版”。可以预见，改革的星星之火必将在神州大地形成燎原之势。（2014年2月13日《解放军报》）

【铁腕治霾】雾霾，已经成为今年地方两会反映最为集中的环境问题，一些代表委员甚至直接指着窗外重度污染的天气慷慨陈词。作为回应，绝大多数省份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大气污染治理，并不约而同开出“军令状”。“铁腕治霾”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各地已深深体会到透支环境的“得不偿失”。与大气相比，我们周围的水、土壤、生态等环境现状也同样令人担忧。治理环境，必须要从口号落到实际行动上来。（2014年2月16日《经济日报》）

【新型城镇化】纵观今年地方两会上各地提出的城镇化目标，因地制宜是最大特色。北京和上海都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纳入今年的工作任务，在这两个常住人口过2000万人的特大型城市，人口数量的无序扩张只会加剧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矛盾，牺牲应有的生存发展权利。而四川等地提出“突出生态、宜居、绿色、低碳城市理念，注重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让城市融入自然”，让人们看到了改变“千城一面”的希望。贵州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要求重视在县城和小城镇通过产业发展集聚人口，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就地创业、安居乐业创造条件，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步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这才是“人的城镇化”题中应有之义。（2014年2月16日《中国产经新闻报》）

【单独两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之后，浙江、安徽、江西、天津、北京等地近期纷纷释放“单独两孩”政策落地时间表，这也成为地方两会热议的话题。河北、陕西、宁夏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单独两孩”政策，而代表委员的关注点则在于政策落地后会否带来新一轮生育高峰，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竞争加剧。（2014年2月17日《瞭望东方周刊》）

【政府购买服务】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新时期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的根本要求，也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政府购买服务不仅成为2014年地方两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也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据记者统计，至少有26份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政府购买服务，占所有省份的近八成。从中可以发现，今年政府购买服务将加速“落地”，而发展重点略有差异。（2014年2月17日《中国政府采购报》）

【分权】山西省日前出台规定，试行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财物工作与工程建设、行政审批事项。此前广东、辽宁、安徽、云南、重庆等多个省份及市县都做过类似尝试，专家称，对一把手分权将成为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趋势。对一把手分权，这种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存在寻租机会的环节是因为权力的存在，有资源分配权就有被糖衣炮弹打中的危险。因此，权力在谁的手上不重要，权力如何运行才重要。对一把手分权限权只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第一步，通过制度设计，依法依规将各种权力的运行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更好地预防腐败。（2014年2月17日《新华日报》）

【倒查】湖北省委组织部公布了全省开展超职数配备干部专项清理、“带病提拔”干部集中倒查和干部破格提拔集中自查工作情况，特别是对有问题的干部提拔任用过程进行调查，的确违反选人用人原则或者营私舞弊造成“带病提拔”的，追究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认真看一下许多落马官员的腐败经历，就会发现，他们的经历，既是一部腐败史，又是一部“带病；提拔”史。更让人不解的是，一旦东窗事发，那些一手促成这种局面的相关官员，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同时又纵容了组织人事工作腐败，进而引发了其他领域更为严重的腐败，形成了恶性循环。由是观之，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做法很有启示意义。（2014年2月17日《新华日报》）

◆纵 横

“啬夫式”的口舌之风

张释之是汉文帝时的司法官，先事文帝，后事景帝，以公正不阿闻名。而他许多见解，在今天仍给人启迪，发人深省。

司马迁《史记》记载：一次，张释之随同汉文帝来到上林苑虎圈。汉文帝询问陪同的上林尉，登记在册的禽兽情况，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东张西望，都答不上来。这时，管老虎圈的啬夫就出来回答，答得极周全，他还想借此显示自己百问不倒的样子。文帝称赞说：“做官吏难倒不应该像这样吗？校尉不称职！”于是就让张释之任命那啬夫做上林令。

张释之问文帝：绛侯周勃和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文帝说：他们都是长者。张释之就说，周勃和张相如都是长者，可他们都不善辞令言谈，没有啬夫那样口齿伶俐。张释之劝告文帝，任用官吏不能光看能说会道，而应从大处着眼，看其为人，否则就会“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文帝听了觉得有道理，就不再任命啬夫做上林令。

啬夫虽没做成上林令，但“啬夫式”的口舌之风，却绵延不绝，在今天已是一种“社会时尚”。学术领域，泡沫泛滥；领导场上，空话连篇。辞语之盛，蔚为大观。2013年8月10日—9月13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和“民智市场”联合做过一项关于“官场形式主义状况”的调查，在列出的“公众最反感的10种形式主义”中，“领导讲话假、大、空”居榜首。

根据得票率排序，“领导讲话假、大、空”得票率66.6%，为第一；第二是“为迎接上级视察弄虚作假”，得票率65.6%；第三是“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得票率63.5%。其他依次是“华而不实的规章制度”（54.4%）、“走马观花的下访调研”（54.3%）、“抓工作只重表面、不重实效”（53.7%）、“上有政策，下有对策”（52.6%）、“总结汇报报喜不报忧”（51.0%）、“内容空洞的文山会海”（49.9%）、“铺张浪费的节庆晚会”（40.7%）。

这十项“公众最反感的形式主义”，都与口舌之风相关。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指出：“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今天我们说得够多，做得很少：会议满天飞，新词满天飞，数字满天飞，报告满天飞，花里胡哨东西满天飞。“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这“五多”是人们对当下公共话语泡沫的概括。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但不知从何时起，下基层调研完全走了样，上面提前“踩点”，下面提前“排练”。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时，一些能说会道的来背“标准答案”；查看实际情况，多是“繁花似锦”的示范点……这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

战国时期，韩非在《五蠹》中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悦其辩而不求其当”，是很危险的。在上面的故事中，张释之告诫文帝，人们在官场上攀比谁有口舌之才，是非常危险的。

当年啬夫虽逞口舌之能，但毕竟没说假话，只是显摆而已，今天说漂亮话蒙骗领导、糊弄百姓的事儿很多。在文帝那里，啬夫没被提拔，但今天“做得好不如说得好”，易得提拔是事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基层干部正是深谙此道，才在口舌之风的形式主义上大下功夫。

“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这种公害，亟当力戒。（2014年第1期《决策》秦德君）

◆文 坛

包公是“考公”考出来的

日前受世界包氏宗亲联合总会之邀，跟随副会长包建国先生到合肥市瞻仰了包公墓和“李（鸿章）家建”的包公祠，还到包公镇实地考察了“包青天”故里小包村，权作一次不无意义的采风活动吧。

胡适曾“小心求证”过“包拯是一个有福之人”。包公之福在于，他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参加的距今987年的“公务员考试”，碰到了一个好考官——编纂《册府元龟》并撰总序的刘筠，尽管他擅长诗词文赋，却把原以诗赋为主的传统考试标准颠覆了，改革为以策论为主的考试新法，比如他出的考题之一《执政如金石论》就是要考生创意出一个“施政纲领”，从而显示未来进士的政治素质和执政智慧，以定优劣级别。包拯中举名列前茅，虽未入前3名但入前30名，与文彦博等同列“甲科一等”。这届贡举考试得法，选拔出了以“包公”为标杆的一批治国理政的出彩人才，故而开创了历史有名的“嘉佑盛世”。

包公以策论脱颖而出，诗词文赋留下的实在凤毛麟角，他29岁中举，39岁才出仕当官，有人考证唯一留下的一首五言诗就是他即入不惑之年所作：“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包青天诗言之志就是清心直道，他遗留下来的奏折有171篇之多，将近1/3是为减轻老百姓沉重负担而呐喊的，在包公24年任职期间遭其弹劾而罢官、法办、降职的贪官污吏及无德无才之辈不下30人，有的还是皇亲国戚。包公一脚踏入谏院，立马出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向皇帝老子宠爱的张贵妃的亲伯伯张尧佐开头炮。七次上书，历时两年，几经波折，又勇又智地与仁宗面对面“廷辩”，终于促使皇上“稍割爱情”，“断以大义”。民间传说、连台本戏，似乎昏君怕青天，其实，包公之“福”一半来自仁宗宽宏仁厚，否则在“廷辩”时包拯激动得失态竟把唾沫溅到天子脸上还能保牢乌纱帽？“天下未尝无包公也，第以仁宗为难遇耳。”明代大臣刘定之“嗟乎！”不无道理嘛。另一半“福”来自包公睿智，他像魏征一样有超级游说天才和沟通天子的才智，所以同朝的欧阳修、范仲淹一一被贬谪，而没有包公那般成就“有福之人”。

最近媒体话“家风”，包氏宗亲此次返故里祭祖，让笔者有幸读到包公留下的一篇奇而特之又言简意赅的《家训》，深感此训百家可训、人人可风。包拯63岁在审理案子时病倒，临终时的遗嘱即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2014年3月4日《新民晚报》姚荣铨）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